本版编辑：史小今
E-mail：m2@studytimes.cn
Tel：010—62804757



国际政治

# 中俄合作：大国关系的典范

## ——访俄罗斯驻华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先生

**如何评价目前中俄两国的双边关系？两国经济贸易合作未来会有哪些亮点？中国和俄罗斯将如何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共同推进互联互通？ 就这些问题，本报采访了俄罗斯驻华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先生。**



俄罗斯驻华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先生

**在俄中两国大规模和多方面的合作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问题，但这些问题都在彼此关照和尊重对方核心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友好、建设性的协商途径得到了解决。**

**对于俄罗斯经济的发展前景，我认为非常乐观。我相信，尽管存在着外部压力和不利的世界局势，俄罗斯在近期仍将恢复经济的快速增长。**

□ 本报记者　史小今

**学习时报：**中俄关系被中国和俄罗斯的国家领导人称为“大国关系的典范”。尤其是近两年来，中俄关系不断升温，中俄两国合作交流频繁，请问您怎样评价目前的中俄两国双边关系？

**安德烈·杰尼索夫：**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正处于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在两国人民的全力支持下，这种关系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并不断持续迅速发展。

在俄中两国大规模和多方面的合作中，不可避免地遇到的各种问题都在顾及伙伴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友好、建设性的协商途径得到了解决。

我们的根本利益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性，无论是在双边关系上，还是在国际事务上。在涉及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的关键问题上，我们彼此给予了对方坚定的支持。在国际舞台上，对于那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双方亦保持着紧密联系。必须指出的是，我们两国在国际事务最复杂问题上的负责任立场，以及对于对外政策措施的有效协调，都已成为维系世界稳定的强有力因素。

6月25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成为俄中关系高水平发展的一个显著证明。两国领导人进行了会晤，就能源、飞机制造、金融、林业、航天、和平利用核能等领域的合作，签署了一揽子内容丰富的政府间、部门间和商务性协议。

在关键的总结性文件《联合声明》中，双方强调，坚守以《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基础的、世代相传的友好信念。今年，适逢该条约签订十五周年，双方指出要快速发展经贸、投资、金融、能源、科技、农业等领域以及地区间的合作，并强调了互办“主题年”项目对于加强双边关系在公共社会基础层面的意义，这其中就包括“媒体交流年”（2016—2017年）项目。

除了上述总结性文件《联合声明》以外，会晤期间，双方还签署了一些单独的声明和宣言，如《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关于协作推进信息网络空间发展的联合声明》《关于提升国际法作用的宣言》。

**学习时报：**近年来，俄罗斯一直在努力进行结构改革，目前取得了哪些成果？您对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前景有哪些评价？

**安德烈·杰尼索夫：**对于结构改革的必要性，俄罗斯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明确。政府一直在对经济采取优化措施，恢复并加强传统工业领域的地位、发展中小型企业都已成为改革的关键方向。近几年，这些努力带来的一些成果的确非常显著。

总的来说，在西方针对俄罗斯采取经济和金融制裁以后，俄罗斯就开启了结构改革的新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实现进口替代。这种进口替代并不是完全隔离俄罗斯市场，而是旨在替换、多样化和寻求更多的进口来源。卢布贬值也使得原料深加工、机器制造、轻工业和重工业以及中小企业有机会得以发展。

农业部门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全世界对粮食的需求正迅速增加。而俄罗斯拥有地球上相当大部分的肥沃土地。我们力求在未来的4—5年中能够充分保证所有主要粮食品种的自主性，并在未来将俄罗斯变为全球最大的食品供应商。

结构改革的另一项主要任务，是降低经济对能源出口的依赖性。去年，世界石油价格急剧下跌，这严重打击了国家的预算收入，由此也清晰表明了此项改革任务的迫切性。现在的改革为健全国民经济结构提供了可能性。

我们十分注重科技领域的发展，注重融入新的技术规则。前不久，俄罗斯创立了“超前发展区”，那里的驻在单位，包括外国公司，都可以获得非常大的税收和关税优惠。这样的发展区大部分位于远东，拥有不同行业或专业的驻在单位。“超前发展区”吸引着外国投资者，为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对于俄罗斯经济的发展前景，我认为非常乐观。我相信，尽管存在着外部压力和不利的世界局势，俄罗斯在近期仍将恢复经济的快速增长。

**学习时报：**中俄两国一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尤其是近两年来，中俄的经济贸易合作更加密切。2016年，中国启动了“十三五”规划，请问在“十三五”期间，中俄两国在经济贸易合作上会有哪些推进和亮点？

**安德烈·杰尼索夫：**的确，近年来，俄中关系在各个领域都得到了迅猛发展，其中就包括经贸领域。尽管一系列客观原因（主要是原料商品价格的下降）导致去年双边贸易额有所下降，但是今年已经出现了积极的增长态势，受多种因素影响，这种正增长将会逐渐加强。

第一，一些领域正在实施战略合作项目，例如：能源、民用飞机制造、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等。第二，国际市场正在逐渐恢复，一些传统的俄罗斯出口商品（特别是石油）的价格正在增长。第三，卢布贬值增强了在俄罗斯生产产品的竞争优势，这有助于增加对国外市场（其中包括中国市场）的供应。第四，两国商界正在逐渐适应变动的市场行情。例如，根据前四个月的统计结果，原料商品在俄罗斯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从65%降低到了53%，而机器和设备的出口增至3%。在一些特色领域，双边的务实合作也明显活跃起来，特别是农业领域。去年以来，俄罗斯农产品对中国的出口一直维持着稳步增长。这一积极态势今年仍在继续，仅俄罗斯谷类产品的供给就增加了66.5%。除此以外，“解除向中国供应俄罗斯肉类和禽类商品的禁令”的谈判，正在继续进行。在不久的将来，如果中国市场对该产品开放，那么将对双边贸易的整体指标产生积极的影响。

**学习时报：**2016年或2017年初，俄罗斯拟发行人民币债券进行融资。同时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的一些能源交易也已经采用人民币结算。请问您怎样评价人民币未来在国际经贸往来中发挥的作用？

**安德烈·杰尼索夫：**中国货币的流通性及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正在以惊人的步伐增长。去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决定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而我们也不应对此袖手旁观。值得注意的是，在该基金组织投票前夕，俄罗斯央行宣布将人民币纳入俄罗斯的黄金外汇储备，从而支持了中国。

在我们两国之间的边境贸易中，广泛使用着本国货币。两国央行已达成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他们成立了工作组，其主要任务是增加本国货币在双边贸易额中的份额。根据2015年的统计结果，人民币在双边结算中的比例约占9%。一些俄罗斯银行已经推出了人民币零售项目，例如外汇兑换交易和存款。双方在人民币贸易融资领域的合作也得到了积极发展。2015年10月，俄罗斯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签署了《金融合作备忘录》，该文件计划推动本国货币的结算和促进本国货币债券的发行。

自2010年12月开始，在莫斯科证券交易所平台进行的人民币—卢布的货币交易也显示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去年其交易量达到了110亿美元。2015年3月，莫斯科证券交易所推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卢布与人民币期货交易，根据去年的统计数据，其总交易额为4600万美元。

至于说到中国货币的未来及其使用的增长速度，这完全依赖于中国下一步的金融改革，首先涉及的是国家资本账户的开放。对于中国的所有合作伙伴来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因素是非常重要的，这提高了人民币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作用和意义。除此以外，在中国创建相应的金融基础设施，将复杂的金融产品（特别是卢布和人民币的长期期货贸易）投入使用，这些也都需要时间。

**学习时报：**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期间，与普京总统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请问，未来中国和俄罗斯将如何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继而共同推进互联互通建设？

**安德烈·杰尼索夫：**俄罗斯和中国正在积极推动欧亚经济联盟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的合作。双方已经举行了两次有相关部委和部门代表以及欧亚经济委员会（作为观察员）参与的工作组会议，讨论了初步取得的成果和今后进一步对接合作的前景。

需要强调的是，创建工作组并召开会议，与落实2015年5月8日发表的《莫斯科声明》有关，该声明是两国领导人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俄期间通过的，启动了广泛的对接进程。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之间的对接工作，不仅是俄罗斯，还有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

去年，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通过了相关决议。为了与中国就经贸合作协议草案进行谈判，以及首先以欧亚“五国”的形式协商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路线图”的草案进行谈判，欧亚经济委员会开始了指导方针的制定工作。

今年5月中旬，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批准了与中国进行谈判的主要提案。这里涉及的是与中国共同制定“能够成为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之间经济合作核心”的经贸协议，确定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的主要方向。我们认为，委员会的这份共同决议对欧亚经济联盟的所有成员国来说都非常重要，因为该决议对于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开始与中国谈判提供了机会。

2016年6月25日，在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欧亚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部长级）尼基申娜在欧亚经济联盟所有成员国外交使团团长的见证下，与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签署了《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关于正式启动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谈判的联合声明》。

欧亚经济联盟内部关于“路线图”的工作还在继续。据我们所知，该“路线图”计划包含所有欧亚“五国”协商的合作项目，其中包括交通和通信领域的项目。下一步应当是欧亚经济委员会与我们的中国伙伴一起，对文件进行协商。未来被批准的“路线图”，对于所有相关方来说，都应当将其作为加强欧亚空间全方位互联的方向标。

同时，在世界经济区域化特色不断加强的背景下，我们认为应当利用俄中两国关于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的协定，作为推动由所有相关国家参与的、能使欧亚经济合作达到更深层次的、广泛一体化的工具。从这个观点出发，对接工作将成为步入广阔而久远发展道路的重要一步。特别是，我们认为，在普京总统去年12月提出关于欧亚经济联盟国家、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及东盟国家参与并以平等互利原则建立经济伙伴关系的倡议下，采取相应的措施是非常必要的。在这个广袤的空间，联合各方形成一体化，这样的努力无疑会具有强大的效果。而且，该主题已经成为俄罗斯—东盟周年纪念峰会（索契，5月19日—20日）以及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会议（阿斯塔纳，6月1日）议程中的关键主题之一。对于欧亚经济联盟来说，相关工作已经展开并取得实质性成果，比如，与作为东盟成员国之一的越南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并研究与东盟其他一些国家签署类似协定的可能性。此外，还应挖掘上合组织的潜力。去年12月15日，在郑州举行的上合组织政府首脑会议上，上合组织成员国总理们也讨论了这个问题，在会晤结束后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强调了采取协调一致的方式进行区域经济合作的意图。在我们看来，这将为今后在上合组织的参与下，推动该领域的共同行动打下基础。

# 我国对外援助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建议

□ 王　磊　殷　悦

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的影响力大幅提高。随着对外援助规模扩大和国际地位变化，以及世界对中国期望的提高，我国对外援助政策也需要相应调整。“十三五”时期，我国应秉持正确义利观，在保持自身政策优势的同时，调整改革援外模式，以更好实现外交目的、大国责任和商业利益的统一。

## 我国援外新形势

我国援外持续发展，其规模、内涵和涉足的领域明显扩展。一是援助金额迅猛增长。根据《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截至2009年底，我国累计对外提供援助金额2562.9亿元人民币，而2010年至2012年，我国对外援助金额已达893.4亿元人民币，占此前我国数十年援助总额的1/3强。这表明近年我国对外援助明显提速。二是援助手段和项目增多。由传统的项目建设、提供实物和派遣专家等，延伸到多种金融援助、技术援助、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派遣援外医疗队和志愿者、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减免受援国债务等。近年来又陆续增加一批新的援助项目，如2010年我国在贝宁、莫桑比克、老挝等国援建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2003年起在亚、非多国启动的“光明行”医疗卫生项目。三是参与主体更加多元。我国援外主体已经由政府向企业、个人、民间组织等拓展。

受援国对我国援助的要求更加多样化。首先，受援国对我国经济的重要性显著提升。中国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贸易额占中方的比例从2000年的50%降为2013年的34%，而同期作为我国受援国主体的发展中国家占比则从23%增至50%。2013年我国与前者的贸易总额为1.4万亿美元，与后者的贸易总额达2万亿美元。广大受援国不仅是我国海外能源、矿产资源的主要供应地，还成为我国企业、产品与投资流向的新兴地。以非洲为例，目前我国对非各种投资存量累计达1000亿美元。其次，受援国对我国的期待和要求提高。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甚至将我国视为“发达国家”，赞比亚、安哥拉等大批受援国要求我国提供更多的经济援助，认为我国援外支出占GDP和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过低。在经济援助之外，苏丹、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国还明确表示愿意学习我国治国理政经验，要求我国增加对其党政官员培训和执政技能援助。

我国与其他援助国的相互影响增多。其一，我国对传统及新兴援助国的影响加大。我国经济增长和减贫经验受到广泛认可，2009年起，“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和中方成立共同研究小组，旨在吸收中国经验，近年，中美亦将援助非洲问题纳入“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在南南合作大背景下，我国推动新兴国家突破西方主导的援助理论体系和实践范式，如2014年7月“金砖国家”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重点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其二，传统援助国希望借助国际规则“规范”我国外援。西方长期坚持“民主援助”，世界银行宣扬“没有民主就没有发展”，美、欧频繁批评我国“不干涉内政”的援外模式，将中非经济问题政治化，发展问题意识形态化。其三，我国参与多边发展援助增多。以经合组织（OECD）为代表的国际发展援助机构经验丰富，值得我国借鉴，我国援外的多边色彩不断增加。如我国多次参与经合组织主办的援助问题高层论坛，参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制定和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设立。

## 面临的几个问题

部分援助项目与受援国实际需要“脱节”。受援国期望日趋多元，已由物资需求上升到技术转让、基建支持和发展能力建设等。国际援助模式也已从简单项目建设向发展援助模式转变，倾向基于受援国国情进行长期能力培养。而我国援外中的“交钥匙”工程仍占相当比重，援外最大组成部分是基础设施项目优惠贷款（2010至2012年占我国援外总额的55.7%）。同时，由于事前缺乏详细的调查和科学论证，部分项目效益不彰，影响不佳，造成资源浪费。如我国在非洲援建的一些体育场馆、在东南亚援建的政府办公大楼被认为过于“超前”，当地缺少与之匹配的、合适的场馆设备操作与维护人员，部分铁路、园区等援建项目由于市场不足，闲置严重。

民间参与有限。我国援外主体虽然多样化，但仍由政府主导，并以大型政府工程项目为主，企业、个人、民间组织未发挥应有作用，处于边缘化地位。如今以政府为行为主体的模式很难满足受援国多方面、多层次的需求。而民间组织由于其利他性、中立性和志愿性，参与对外援助工作有助于树立援助方的正面形象。但在目前，我国的民间组织参与对外援助工作还面临诸多障碍，仍处于政策执行者地位，作用极其有限。国内相关的政策、法律缺失，资金支持不足，使得民间组织的国际化之路更显艰难。在民间组织的援外方面，我国明显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与此同时，在网络媒体发达的当今时代，以政府名义开展的援外工作深入公共视野，在一定条件下容易激发舆论误解，2011年“援助马其顿校车”事件便表明，争取民间支持和参与援外非常迫切。

对国际援助发展研究不足，援外理论与人才培养欠缺。西方发展学臻于成熟，并以此培养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大量专业人才。目前，我国大学尚未开设发展学专业，随着我国援外规模迅速扩大，相关理论积淀、人才培养不足的缺陷成为制约援外工作开展的瓶颈。

## 进一步做好援外工作的建议

加强顶层设计。目前我国对外援助主要由商务部管理，容易给外界以口实，认为我国援外举动隐含商业动机。因此，我国应明确区分援外项目和商业项目，前者重在利他，后者强调务实互利。管理体制已经不适应甚至阻碍当前我国援外规模的迅速扩大，以一个部门的力量已难以应对涉及多部委的援外工作，因此可考虑成立专门的国际发展部门统管对外援助。

加强援外立法。我国目前尚未颁布任何援外法律，援外管理主要靠商务部行政命令，其系统性、权威性不足，难以对现行部际协调机制产生有效约束与指导，应尽快进行专项立法。我国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援外法律制度的合理成分，制定出有中国特色、体现南南合作特点的援外法律法规。

强化对援外项目的监管和评估机制。目前我国援外项目只有“总结报告”，缺少有效的评价体系和专业的评估机制对其综合评估，既降低援外效果，也易招致外界误解和指责。建议我国援外项目引入系统的规划、监督和评估体系；同时突出“中国特色”，将“经济增长”和“减贫”作为两大标准，并注重实效；分离项目执行和项目评估的责任方，将监管评估工作交由独立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实施。

加强国际合作。我国正表现出更多开展三边、多边合作的意向，发起的亚投行也有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合作的意愿。因此，我国可尝试拓展在低敏感领域，如农业、卫生等援外领域增加与西方合作，也借此提高中方机构和人员的专业水平，提升援外能力，增加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权重。

热点观察